

参 考 信 息

江苏理工学院图书馆主办 第 10 期 (总 164 期) 2014 年 9 月 20 日

大学文化是大学发展的灵魂

编者按：大学是传承文化、研究文化、创造文化、发展文化的学术殿堂，大学文化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灵魂与内在动力，持续激励着大学人向着继承文化传统、吸纳时代风气的更高层次迈进。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学文化，不仅营造知识创造、学术追求、社会奉献的精神氛围，也引领整个校园的精神风范在整合中发展、在新变中淬生，并贯穿在一届届毕业生内心深处，是促进他们成人成长成才的精神灯塔。大学不仅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而且肩负着传承、发展、创造先进文化的历史重任。大学文化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前瞻性的工作，以精神文化为核心，培育和提升大学精神；以制度文化为保障，构建和维系大学秩序；以行为文化为基础，树立和塑造大学形象；以环境文化为依托，展示和发展大学品位。为此，我们选编部分材料，供领导和相关部门参考。

目 录

1. 大学文化的冲突与重塑..... (2)
2. 中外大学文化的同分异构现象与启示..... (5)
3. 大学文化建设：何种文化 如何建设..... (9)

大学文化的冲突与重塑

（一）大学文化冲突的社会肇端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前，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裂隙正在逐渐加深与增大：原本应该适应文化生产力的体制束缚并没有完全摒除和纠偏，理应引领和教育人民、服务与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并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国家文化的整体实力与其国际地位并不相称，“西强我弱”的世界文化格局尚未根本扭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学文化的价值传统和自我塑造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功利化倾向与大学治学法则之间的矛盾、市场多样化需求与大学相对固化的人才培养系统之间的矛盾等也渐趋尖锐，显现出较明显的冲突表象。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冲突。文化相对稳定，它与更迭迅速的社会思潮之间矛盾丛生。大学属于自体特征较明显的社会子系统，它所展现的冲突具有前置性特征。当转型期社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多元文化正在冲击原有的教育理念和传统价值观，这其中包括对传统法则的摧毁，对新兴外来文化的推崇，都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混杂的融合趋势。大众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一旦形成，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这种酷似“疫情效应”的作用，往往伴随着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失范：个体的行为、观念和心理容易陷入盲目混乱和无序状态，拒绝具体标准和原则来指导和约束；精英文化是一种“高雅文化”，个人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素质修养作为铺垫，否则将无法进入高层次的接受状态。因此，精英文化的接受者往往只能特定阶层的“少数派”，这其中包括大学中的校园人群，他们是先进观念、严谨学术和知识体系的生产者、拥有者和传播者，能够借助严格的科研规范，自发地进行文化和实践的转承、分析与研究：重视精神的超越性，既注重审视现实，又关照彼岸世界，给人以终极关怀，它往往批判、监督、提升和引领大众文化的发展。当下的大学文化建设，吁求着一种社会主导意识下的理性重塑：精英文化一方面引领和提升大众文化的价值格调，让大学文化能够站立于受众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博采众长，源源不断地吸收高校围墙内外广阔土壤中的更多营养。因此，从大学文化角度看，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大学文化功能游走在精神的塔尖和关注普罗大众的精神启蒙之间的选择与兼顾。

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经济的全球化加快了世界的政治多极化、科技国际化和文化多元化：“在全球化格局下，我国以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大的阶段性差距，在同一个时空中与发达国家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西方文化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对我国的民族文化，也包括大学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异质的“价值乱象”撼动着大学文化在校园中的主体地位，种类繁多的新兴载体和“原汁原味”的舶来文化，在渗透、胁迫甚至扭曲着大学校园中文化的消费主体——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有人不免担心：“现在思想的窗户已经彻底打开，这是一件好事，但是窗口有飘香的鲜花，也有很多散发恶臭的垃圾。”一方面，大学生群体鲜有现实阅历和人生辨识，对异质文化的诱导和“催眠”缺乏免疫力，往往只是欣喜若狂地呼吸着“气息不同的空气”；同时，尚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始建初期，在价值观和利益求索发生激烈的动荡和交锋时，“文化侵略”和“西进同化”的狼烟便会甚嚣尘上，别有用心的文化抽取和价值演变行为便会不同程度地消解大学文化的影响力，所有价值的“新法则”都被贴上“多元化”的标签大行其道，倾向于张扬自我的大学生很难坚守客观理性的辨识立场，相反更喜欢否定“本我”、倾向“新我”，越来越接近边缘化、非主流的思潮反而会占据他们的道德中心。因此，这种冲突的实质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博弈，是如何承继文化遗产与如何批判地选择和吸收异质文化之间的权衡。

大学本体与他者的冲突。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处于低发展基数带来的高速发展效应之下，改革的深度与覆盖面均史无前例，“贫富分化”、“潜在规则”、“权钱交易”、“特权效力”……这些难以避免的现实病痛所造成的伤口时刻刺痛着公众的“敏感神经”，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阶层利益的改弦更张在改革进程中呼声愈来愈高。同时，伴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功能也展现出高度专业化和学科分类化的两极，这其中或多或少会产生模糊不清的培养定位、层次不齐的教育水平、功利毕现的速成路径、单一僵硬的评价标准等等“短板”。在现实基础的撼动下，大学虽然试图调整和重新订立与不同客体之间的关系，但“社会意识”对大学文化的导向产生弱化与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文化的迷惘也必然带来信仰的坍塌：“我们诞生于一个缺乏价值模仿的年代，没有英雄作为人生的标杆，也没有大师作为治学的典范。”有大学生这样直言不讳地诠释当下大学校园中师生思想中的“集体无意识”。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主导价值观教育，在理论准备、教育过程和效果评价等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理论成果与实践高度难以协调一致。因此，这种冲突是由于社会在体制惯性之下，缺乏解读和应对“灰色意识”的教育系统，文化的指导力频频遇挫，文化本体与现实土壤之间呈现出实践的冲突与偏离。

（二）大学文化冲突的特质解读

当大学参与社会活动日益频繁，开始扮演纯粹教育活动之外的诸多社会角色时，就无法排除其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但就整体而言，大学本体流淌的依然是文化的血液。面对科学技术的现代性扩张，吉登斯说：“只有通过科学技术，才能回避科学技术。”大学文化只有通过自我特质的改造和更新，才能完成对冲突的解构和转化。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曾论述到，昔日的共同体和现在发展形成的社会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共同体中，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得到社会群体“一致认可的自然而非人力强加的意愿”；而当下的社会则是基于某种理性契约（如法律、规则）构筑基石，相互之间的认同感缺失而淡漠。因此社会更像是有条不紊进行机械和链条间运动的集合物，只有在诸多方面进行缓冲，才能像共同体那样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体。这对解决大学文化的冲突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不同个体的容忍与宽容。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组织会通过自身调节来自发地消除冲突。“冲突并不总是不利的、负面的，它有可能是中性的或有益的”。也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冲突本身，而在于对待和处理冲突的立场、态度和使用的方法。“容忍”与“宽容”是构成大学文化的要素，是大学文化涵育功能的体现，它有着很多丰富而现实化的表象。比如对于他人失败的容忍，表现在对科学探究中百折不挠的人的宽容态度；对于合作者和学生不同性格秉性的宽容，表现在对他人个性行为的充分尊重理解；对不同意见立场的容忍，表现在学术领域的论辩摒弃限制和约束，倡导学术自由的空气；对于自我的宽容和容忍，表现在追求卓越、追求生命价值的能动性之下，也不必承担过多的界定目标和自我要求，而是主动减“负”减“压”，注重塑造健康的文化人格和人生态度。

对预期利益的沟通和舍弃。在管理结构的视域中观照转型期的高校，很多都达到“万人大学”的规模和架构，一级组织下有着学院、部门和其他组织的分支，在这些分支下，又有着许多第三层次的机构，直到最后分解成极小的组织或者个人。因此在这一网络中，不同的个体或者组织都归属不同的利益团体；出于不同的利益追索，就会产生冲突和矛盾，因此为了一级组织的共同目标即大学的发展，组织间的紧密沟通和适度妥协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现实中，大学的各个层级往往会造成因为沟通不及时，渠道不畅通。其实，在最上级目标利益一致的前置条件下，沟通乃至适度舍弃都是明智的选择。大学是一个整体，更多时候追求的不是独赢的局面，而是双赢、多赢的结局，这就意味着在统一体中的各方应该做出一定的让步；从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来考虑，为了整体组织目标的顺利实现，善于解决冲突。

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包容。大学文化深刻地反映着科学精神，也区别于一般的大众文化、市井文化和俗文化。但大学文化又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形态，这种“多元”中固然存在着某些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美好与丑陋的区分，但更普遍地表现为各有短长、瑕瑜互见，更多地包含着互补的关系，而不简单地仅仅是排斥和冲突。同时，大学是众多学科并存共荣的场所，具有学科交叉融合的天然优势，是彰显文化理解和文化包容的良好土壤，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科技通信的充分利用、为校园人群提供了频繁、深入地接触各种不同多元文化的可能性，让不同的文化在统一体中相互尊重，取长补短，互惠互利，让大学“充满着辩证法”。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包容也是大学治学昌明不可或缺的营养剂，创新的学术思想常常萌发于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撞击之中，大学的杰出人才固然重要，但群体性智慧的融合也必不可少，理论创新往往是群体思维的产物。“百家争鸣”能繁荣学术，“兼收并蓄”能凝结精神，这对当下文化的繁荣发展意义深远。

（三）大学文化的路径重塑

1.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作用，坚守大学文化的核心精神

大学的“核心精神”即“象牙塔精神”，是一种在功利性较强的社会环境下坚持“合理坚守性”的精神特质。从欧洲中世纪的现代大学建立至今的八百多年历史表明，大学虽然在具体制度、职能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大学文化的核心要素——民主自治和学术自由并没有根本改变。这是因为大学首先是“精英的团体”，大学自治的本意是让学者们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外来的控制。“自治是学术自由的组织保证”。同时，学术自由又让大学学者(包括教师和学生)可以不受约束、不受限制和不受威胁地探索学术问题、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并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包括对公众利益负责、对社会进行合理批判，保持与民间和大众的张力。当涉及社会思潮和文化责任时，如果学者保持沉默，他也就放弃了判断，放弃了人类利益，其后果是必然陷入自治的偏执、保守和排斥，这与学术自由精神格格不入。

基于认识论的角度，“现代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主要基础是政治论的，今日的学院和大学已陷入错综复杂的社会力量的网络之中，常常卷入人的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坚守大学的核心精神，不仅让大学文化保持对普罗大众的关注和思索，更让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得到了存在的合理性，不仅保证了大学运转的学术逻辑，更可以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兼及与融合得以实现。因此，大学文化的重塑，从本质上来说都代表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对其子系统的书写。我们必须注重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大学文化，有效抵制不良文化建设对高校师生的精神污染；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自立自强为核心的时代品格，让所有师生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思想情态；长效性地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培育全体师生的品格修养，努力解决转型期涌现的道德课题，促使形成良好的校园氛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学、管理和研究和大学教育过程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使广大师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

2.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过程，回归大学文化的本源旨归

大学文化的本源与旨归在于“教人如何在社会中生活、热爱生活并乐于承担工作的基本职责；教人如何改造这个世界，并以此作为他们理想的皈依”，因此，“真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应该思维严密，知识丰富，具有批判精神而不是书呆子，这样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在外界的纷扰中保持清醒”。又如卢梭所持的观点是：“在成为一名军人、教士或行政官员之前，(教育)先要使他成为一个人”。“大学及其文化应该发现人的才能，训练它们和推重它们，同时培养性格和态度”。因此，大学文化应该彰显知识的进步性和控制力，让我们的头脑睿智清醒，历史感和哲学观明晰，增强我们对多元文化价值的洞察力。

长期以来，面对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价值观困局，我们着眼于文化“外缘的改良”，比

如对大学文化传播途径的审视,对大学文化氛围的营造,对大学文化接受者的管制与束缚等等,这些一味排他的、张扬主导价值观的“有用性”说教,都在外围无力地游离,无法直指文化改造的核心。因为“有用性本身也是一种功利性的价值评判而不是学生的最大财富”,“即使是重要的话,也不过是一种副产品。”在多元文化冲突激烈碰撞的校园环境里,校园人群能否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仅取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力度和教育手段,而且还取决于其能否成为受教育者心中的深层信念,成为实践中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行动遵循的准则——这是对大学文化“教人生活”和“教人全面发展、改造世界”的本源回溯。这对大学组织的学者和管理者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内涵式向度最终将左右和协调大学文化的具体构成和实践,各种文化的合理融合也将容易达成一致。这首先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文化系统中建立起立体化的文化生成、文化接受、文化消费的网络,树立起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价值理想和凝结智慧及力量的价值标杆;其次需要倡导大学文化特有的精神涵义,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等,着力体现对大学文化生态的尊重和师生发展权利的维护,再次应该顺应时代的呼声与需求,将个人价值、个人道德的普适要求和时代的精神标杆相统一,使之成为大学人群的共同理想和追求。

3. 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信念,实现大学文化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指同质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对自体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认识;同时又指异质文化中的人,在充分的自我了解之后,和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接受、相互宽容、和谐并存的“天下大同”局面。大学文化站在社会先进文化的潮头,是社会文化自省、文化改造和文化创造的集中显现,也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思考、文化境界、文化信念和文化关怀,因此,大学文化理应发挥对社会发展的强大渗透力、感召力和驱动力,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文化功能的描述,成为一个民族、政党或国家主导价值观福祉民众、惠及民生的精神引擎。

如何实现大学文化的自觉?首先应秉持这样的观点:“一种文化的存在,只要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科学社会主义的,只要是对国家、人民和学生发展有利的,都应允许其存在”。文化冲突的存现一方面使社会结构产生断裂,另一方面也是文化蓬勃创新的活力源泉。树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价值观,单纯靠压制其它文化,只会导致社会精神生活的单调、乏味与苍白;其次应该赋予大学文化以富有生命力的架构:一方面有着尊重文化差异性、包容文化多样性的“营养给予”,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主导价值观的“大脑”和“心脏”,由里及表依次构筑以价值操守、道德情感、信仰追求等为主的精神文化,以内部治理结构及管理方法等为主的制度文化,以物质实体、环境设施等为主的资源文化等等“皮肤”与“肌肉”。这个系统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始终处于中心位置,而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资源文化则提供着坚固的支撑和保障,文化系统中各个“器官”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再次是秉承“传道授业”之己任,尊崇自由、科学和民主之信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评价标准和选择依据,调整大学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在大学自身的发展与转型上保持适度张力,形成具有每所大学自身特色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图谱。

(摘自:《大学文化的冲突与重塑》学海 2013 年第 2 期)

中外大学文化的同分异构现象与启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大学文化作为社会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包含了以大学为载体,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大学人”所共生、共享、传递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进入了内涵式发展的战略阶段。在加快世界

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过程中,国内教育界充分认识到,没有一流的文化就没有一流的大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将为高等学校的科学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因此,开展大学文化研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工作。

(一) 中国大学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西方困惑”

中国的大学文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末,先后出现了稷下学宫、太学、国子监、书院等承担高等教育功能的机构,这些机构构成了中国的“古典”式大学。当然,严格地讲这些教育机构还不能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但其主要特征和功能与现代大学已非常相似。这个阶段中国大学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并历经两千多年没有发生重大的嬗变,可称为中国古典大学文化时代。第二个历史阶段始于清末的洋务运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这个阶段是中国建设和发展现代意义大学的历史阶段,并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相呼应。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等是中国最早移植西方大学制度建立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此后,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移植日本,效仿欧洲再到模仿美国的模式转变。在此阶段,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大学则成为东西方文化交锋和争持最为激烈的领域。总体而言,此阶段的中国大学文化的主流是“西风”压倒了“东风”。第三个历史阶段始于新中国的成立,延续发展至今并逐步走向繁荣。由此,中国大学进入了由近代大学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学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六十余年来,中国的大学发展虽历经动荡和波折,但大学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已经逐渐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和认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类文化思潮的涌动成为这个阶段大学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一时间,大学文化建设成为高等教育界的研究热点,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近年来,在中国大学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学术界在如何看待东西方大学文化的差异问题上产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有研究者认为,西方现代大学历经了八百余年的发展,凝聚和生成了非常厚重的大学文化以及成熟的大学文化发展模式,仅有百年历史的中国大学理应多向西方学习,仿照其发展模式建设中国的大学文化。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高校中的复苏已经渐成潮流,而且东西方的文化传承、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等均存在着巨大差异,中西方文化的互动、碰撞,只会更加激起中国大学在文化选择方面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时至今日,学术界仍陷于中国大学文化建设风向标“向东”还是“向西”的争论中。因此,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东西方大学文化差异,并以适切之方法使东西方大学文化能够在碰撞中相互调和、借鉴,似乎成为中国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西方困惑”。

(二) 东西方大学文化的同分异构现象

1. 同分异构体与同分异构现象

同分异构体原是化学概念,是指具有相同的分子式,但原子排列顺序不同的有机物。同分异构体之间虽然分子式相同,但却具有不同的空间结构。同分异构现象主要是由碳链异构、功能团位置异构和功能团类别异构等情况造成的,同分异构体间一丝微小的原子排列异位或功能团连接位置的变化,都会导致巨大的物理化学特性差异。以最为常见的同分异构体乙醇和甲醚为例,它们的分子式都是 C_2H_6O ,但二者原子排列的空间结构迥异(乙醇结构式为 CH_3-CH_2-OH ,甲醚为 CH_3-O-CH_3),导致二者无论是在物理还是在化学性质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基于同分异构体现象,我们认为东西方大学文化间的“异、同”与冲突问题,本质上是由东西方大学文化间的“同分异构”造成的。换言之,东西方大学文化实际上是一对同分异构体。

做出东西方大学文化是一对同分异构体的判断首先是基于东西方文明对于大学文化基本构成要素的普遍共识,即东西方大学文化都是由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元素共同组成的,这一基本共识印证了东西方大学文化具有相同的分子结构。其次,中外研究者普遍认为大学文化具有神圣性、理想性、包容性、浸润性、学术性、批判

性、历史性、民族性、独特性等文化属性，也就是说东西方大学文化表现出了相同或类似的“功能团”。造成东西方大学文化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承担大学文化表达功能的“功能团”存在着“功能团位置异构”或“功能团类别异构”情况，这就造成了东西方大学文化间的同分异构现象。

2. 同分异构现象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揭示东西方大学文化的“同分异构”，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将大学文化的研究重点从争论东西方大学文化“孰高孰低”，转移至“洗尽铅华”的新阶段，这就突破了以往过于纠缠于东西方大学文化“优劣之分”的思维局限，也为研究大学文化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东西方大学文化的同分异构现象正印证了《中庸》谈到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基本道理，辩证地解答了二者间存在差异、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中外大学文化比较研究与大学文化建设实践中的一项具体应用。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有的研究因在方法论指导上的缺失，使得大学文化研究显得仓促和浮浅。通过对东西方大学文化同分异构现象的研究和思考，则可以启迪智慧、开阔视野、创新思路，有利于在创建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过程中汲取西方大学文化建设发展中的有益经验，实现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洋为中用、取长补短。

（三）东西方大学文化同分异构现象的表现形式

1. 东西方大学文化的“同分”现象概述

第一，东西方大学文化的历史起源相近。东西方大学文化均源自于本国、本地区的社会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密切相关。肩负文化传承使命的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就成为东西方古代文明发展的共同选择。纵观中外高等教育史，从中国西周时期的“太学”到宋明朝代的“书院”，从古希腊的“雅典学园”到中世纪大学以至近现代大学，它们诞生的宗旨也许千差万别，但在传承文化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第二，早期的东西方大学文化均带有浓厚的宗教或政治色彩。现代大学源于欧洲，而欧洲的大学又发端于教会创办的文法学校和修道院，所以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西方大学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在现代大学中仍得以部分保留，如开学典礼、学位答辩与授予仪式等。中国社会历经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形态，使得中国的古典大学文化带有鲜明的儒家以及佛教、道教色彩，而传统的儒家“礼”文化思想更是中国古典大学文化的历史标签。

第三，东西方大学文化具有相同的育人功能。在大学文化所拥有的众多功能当中，育人功能是大学文化的首要功能。大学文化作为群体认同的一种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文”是育人的核心内容，“化”是育人的基本方法，育人功能则是大学文化的本体功能。东西方大学文化虽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特质和表现形式，但追求真理、培养人才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这里所指的培养人才，绝非仅限于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而是基于苏霍姆林斯基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科学论断而言的，也就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立德树人”。所以，育人功能是东西方大学文化共同的文化内核。

2. 东西方大学文化的“异构”现象概述

虽然，东西方大学文化的内核是相同的，但是东西方大学文化在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中，由于受不同地理、历史、民族和国情等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以至于在东西方大学文化的交流、交融过程中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这正反映了东西方大学文化间存在典型的“同分”而“异构”现象。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大学文化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由于大学的知识生产、传播与社会文化的传统符号和价值相联系，使大学能够从根本上与文化相沟通。因此，源自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近现代大学文化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文化特征。西方大学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支持、追求和鼓励大学和大学人的自由、自治与独立。西方大

学文化的内外在表现，是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传统、长期的城邦制国家制度、市民社会等密切相关的，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和高等教育目标从未偏离宣扬“忠孝仁义”的思想。由于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从来都是紧紧依附于封建王权之上，所以，注重培养国家意识、教育面向现实需求以及强调文化传统，就成为中国古典大学文化时代的主要特征。它一方面助推、延续了灿烂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世界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古典大学文化的这些特征，与西方近代大学追究独立、自由和创新的文化特征显然是大相径庭的。时至今日，在中国现代大学文化的基因中依然留有历史的痕迹。中国近代大学虽然是临摹西方大学制度的舶来品，但在近代大学文化中也延续了古典大学文化时期的某些特征，例如此阶段的中国大学都注重通过源自经典的校训来凝练大学文化，陶冶学生精神境界。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全面照搬苏联大学的建设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学文化的回归，但也使得中国大学文化出现了“千校一面”的趋同现象。当前，快速发展的中国大学“体量”越来越大，但较之于各自的大学文化质量而言，却显得有点“早熟”，这会造成大学快速发展中的“缺钙”现象。为此，中央及时做出了“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决策，文化传承与创新成为新时期中国大学需要承担的第四大社会功能。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则应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首当其冲，并确保其优先发展。

总之，东西方大学文化特别是现代大学文化的“异构”现象集中表现为：欧美著名大学大多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在人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传统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突出科技理性和个人自由，突出人类相对于自然的行为范式与力量；在这方面，中国大学文化精神则更强调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突出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和道德自律。

（四）同分异构现象下的大学文化研究范式

大学文化是大学存在的基础，是大学的灵魂。要建设好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学，其前提是必须对大学文化进行准确定位，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一种可供操作的文化建设模型。基于东西方大学文化为同分异构体的前提判断，根据“霍夫斯塔德文化洋葱模型”和“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构建了大学文化“同分异构体模型”，具体内容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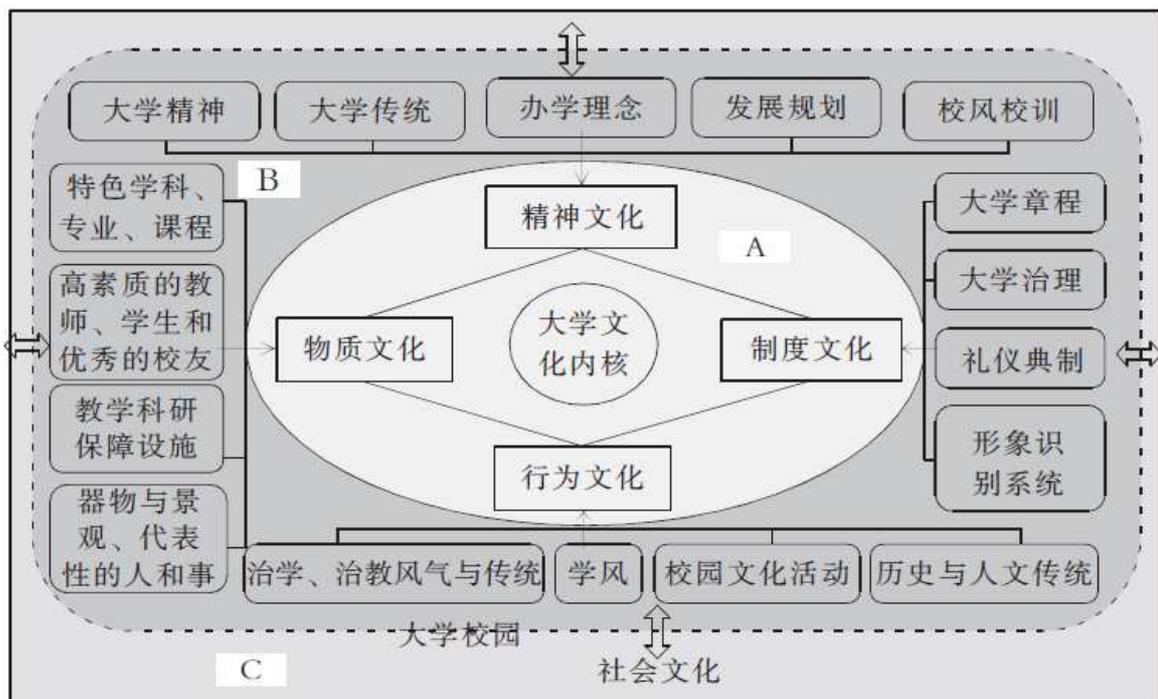


图1 大学文化“同分异构体模型”

大学文化“同分异构体模型”由A、B、C三个功能区组成。其中，功能区A代表着东西方大学文化具有相同的分子骨架，该骨架结构是一种类似于苯环结构的共轭体系，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位于该共轭体系中的核心。功能区B代表着大学文化分子骨架上所连接的各种“功能团”，该区域是东西方大学文化产生“异构”现象的主要功能区域。需要说明的是，模型中所列举的各类“功能团”，仅是归纳整理出的一部分内容，尚有很多“功能团”有待进一步发现和甄别。功能区C为社会文化区域，表明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的亚文化、子系统。区域A与区域B共同组成了大学间各不相同的大学文化，而大学文化又以大学校园为界，说明了大学文化与大学间的相互依附关系。同时，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保持相对独立，但彼此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由大学文化“同分异构体模型”可知，东西方大学文化间的差异和冲突多源自功能区B中“功能团位置异构”或“功能团类别异构”现象；而产生“异构”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功能区C对于功能区B中“功能团”结构和类别的影响。在研究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过程中，应重点把握好“中国特色”（区域C）和“大学文化”（区域A）这两个基本主题；同时，根据大学文化“同分异构体模型”，通过对大学文化内在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区域A），在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广泛发掘和筛选东西方大学文化中的一切优秀特质（区域B），深入研究这些特质背后“功能团”的结构和类型以及“功能团”能够发挥作用的内外条件，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区域C）的指引下对“功能团”（区域B）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大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向社会文化的辐射，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支持和引领。

（摘自：《中外大学文化的同分异构现象与启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4 期）

大学文化建设：何种文化 如何建设

经常出入各个大学校园，自然会看到各种大学文化建设的符号，从校歌校训，到“建设国际国内一流大学”，“民主兴校、人才强校”之类的口号，还有诸如孔子雕塑、赶时髦而建起的咖啡书吧等，这些似乎都在提示我们，这里就是大学文化之所在。这就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容吗？

（一）什么是大学文化：从修饰性大学文化到本体性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有两种基本形态，即本体性大学文化与修饰性大学文化。所谓本体性大学文化，即大学自身的传统与精神，也就是构成大学何以谓之大学的文化形态；二是装饰大学的文化，也就是体现、承载大学传统与大学精神的辅助性文化手段。无疑，就两种大学文化形态而言，前者是根本性的、目的性的，后者是技术性的、手段性的。换言之，后一种大学文化的合法性来源于前者。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缺少了本体性大学文化的支撑，手段性大学文化再丰富，也不过是没有灵魂的缀饰，是大学中的文化符号的堆积。

何谓大学？雅斯贝尔斯在《大学的理念》中开宗明义，“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这里的关键词有三个：一是“致力于真理之事业”，它讲的是大学的内容是探寻高深学问，离开了对知识与真理无止境的诉求，大学就成了知识普及性学校，就失去了思想与精神的高度，大学就成了不“大”之学；二是“学者与学生”，它讲的是大学的主体，大学是以学者和学生为主体，这意味着大学不是官场，不是市场，必须遵循学问的准则，大学也不是军营，必须遵循自由求学的准则；三是“共同体”，大学师生不是知识买卖的关系，大学教授不是大学校园中的匆匆过客，唯有大学师生的亲近交往，大学师生心智的互相磨砺，才足以让大学空间弥散追求知识与真理的意韵，大学才能避免成为知识交易的市场。由此，大学作为致力于追求真理的学者与学生共

同体，意味着大学的组织原则必然体现学人中心，这就是从洪堡以来所奠定的教授治校、教学自由、学生自治的大学传统。

文化究其实质而言，乃是人的活法，大学文化的实质就是大学师生的活法，就是大学师生的人格样式。雅斯贝尔斯认为，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要包含三个相互之间密不可分方面：学问传授、科学与学术研究，还有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不管是学术性的教学、科学研究，还是文化生活，都使得大学师生的生活呈现出更高的创造性、心智的卓越与浓郁的文化趣味。大学文化最终要呈现为大学人开阔的文化生活，也就是富于宽广文化趣味的创造性的生活，一种“有文学气质、有文生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之中，青年学子耳濡目染，浸渍其中，潜移默化，受到普遍智识的陶冶，成为优良的教养之士，“具备有教养的才智，有灵敏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的头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态度”，由此而达成大学之教书育人、化育后学的根本目的。

所谓大学文化，就是激励学生精神成人的文化，就是激励他们不断挑战自我心智、努力发掘自我潜能、全面提升自我人格的文化。即大学之为大学的本体性文化，也就是以大学师生创造性的教学、研究与文化生活为中心的大学生活方式，这是大学文化之为“大学的文化”的根本所在。其余的物质与制度的文化都是为了服务、保障大学师生创造性的文化心智生活。离开了大学师生生活方式的大学文化建设，都是外加的、缀饰性的、缺少大学意蕴的文化符号。

“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有另一种气氛；它告诉我们，有一些问题应该被每一个人思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没有人问，也不可能有答案。它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不许不利于或者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在；它给出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而是因为提供在极高的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大学是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它在人们心中唤起崇敬之情，只有那些将自身观念融汇为一体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感情。”大学乃是因为追求知识与真理而存在，它并不是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庸。优良的大学文化就是要团结这样一个知识人群体，凝聚这样一种精神，以昭示青年学子的心灵，同时烛照社会的方向。这是大学存在的根本理由，也是大学文化的精髓所在。

（二）大学文化的基本内涵：从大学师生的“活法”到大学文化的“说法”

大学文化乃是人与人的交流实践，是大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之间的富于文化气息的生动交流。百余年前的哈佛哲人詹姆逊曾言：“构成一所大学最本质的品质是什么？多年前在新英格兰，据说路边的一根圆木上，一端坐着一个学生，另一端坐着马克·霍普金斯，那便是一所大学。一个学校的质量取决于学校里人的素质。……教育从长远来说是一件在每个学生和他的机构之间展开的事情。我们过多谈论的方法，只起了次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人际接触。”真正的大学就是人与人的交往，年轻人与有学问的长者之间的亲密接触。大学文化当然离不开物质形态的完善，但最重要的是物质形态的大学空间里充满着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充满着师生富于文化意味的生动交流。大学文化必须是鲜活的师生交流，是看得见的大学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共同探究、龟勉追求。换言之，大学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以大学师生为本，以大学师生的积极文化智识生活为本。大学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如何扩展、提升师生积极的文化知识生活。

苏步青曾这样描述抗战时期的教学经历：“浙大师生西迁途中，时有敌机轰炸，我和大家挑着书籍、行李，跋涉于山水之间。一旦遇有敌机空袭，我们就躲进防空洞。我想学生用于学业的时间太少，对于他们成才不利，就找学校的领导和学生们商量，利用敌机轰炸的空隙，在庙宇和山洞内上课。获得校领导同意后，每到一个地方，我们的课堂就搬一个地方，如此接连办学，一直到贵州的湄潭。有一天，外面又传来敌机空袭的警报，我和

4名学生躲进一个山洞。这个山洞，石壁上长着青苔，石缝里冒着水珠，顶上石笋倒悬，地上乱石成堆，不过因阳光的折射，洞里倒显得幽静而明亮。里面有两条板凳，是学生进洞时临时搬进来的。我对学生们说：‘你们喜欢这里吗？我很喜欢，这里别有洞天。’几个同学听了都笑起来。他们分坐在两条板凳上，对这种新的教学环境感到新奇。我略微发挥地说：‘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数学研究室。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是广阔的。大家要按照确定的研究方向读书，定期来这里报告、讨论……’”逃难中的苏步青尽管带着四个学生在山洞里上课，我们同样不能不承认，那里就是堪称世界顶尖水平的大学课堂。原因何在？就在大师，就在大师引领下对知识的无上追求。浙江大学的校训是“求是”，“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而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这是竺可桢校长对求是精神的解读，而苏步青等教授历经艰难，教书育人，正是“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而行之”的求是精神的生动写照。

网上一篇流传甚广的关于哈佛大学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哈佛的学生餐厅，很难听到说话的声音，每个学生端着比萨可乐坐下后，往往顺手把大衣扔地上，然后边吃边看书或是作笔记。我就没见过哪个学生光吃不读的，更没见过哪个学生边吃边闲聊的。感觉里，餐厅不过是一个可以吃东西的图书馆，是哈佛正宗100个图书馆之外的另类图书馆。哈佛的医院，同样地宁静，同样地不管有多少候诊的人也无一人说话，无一人不在阅读或记录。医院实在也只是图书馆的延伸。”央视《世界著名大学》制片人谢娟曾带摄制组到哈佛大学采访。她告诉人们：到哈佛大学时，是半夜两点，可让人惊讶的是，整个校园当时是灯火通明的，那是一个不夜城。餐厅里，图书馆里，教室里还有很多学生在看书。那种强烈的学习气氛一下子就感染了我们。在哈佛，学生的学习是不分白天和黑夜的。哈佛大学之为哈佛大学显然不仅仅在于其亭台楼宇，当然哈佛的物质文化同样出色，更在于其师生的生命所践行出来的对知识与真理的无上诉求，也即哈佛的校训：“真理”。哈佛人的“活法”与哈佛大学文化精神的“说法”相互映衬。

大学文化根源于大学师生的生活实践，大学师生的生活实践又反过来促成大学文化精神的自我完善。大学文化乃是为知识与真理之光所浸润的文化形态，是大学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无条件的追求。大学文化乃是彰显大智慧的文化，是追求大智慧的文化。“大学的使命在于最大限度地激活学生的精神交流，激发他们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勇气。”青年学生带着蓬勃的朝气，在大学场域中，全身心投入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反过来又促成大学文化的新生，并成为大学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三）大学文化建设：以大学教授为中心

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先生刚履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这样论及大学的用人之道：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问。蔡元培之所以在短期内改造北京大学取得巨大成就，正是因为一开始就抓住了大学的中心，其实也就是抓住了大学文化建设的中心：一是以学生的学风为中心，突出人才培养；二是以教授的延聘为中心，提升教学、整饬学问。毫无疑问，如果说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是大学问，大学文化建设的灵魂就是如何成就大学问。大学作为教育空间，其根本目的是培养人。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以大学问来培养大人格。靠谁来培养？当然是杰出的教授。正是好的教授，引领了优良的学问生活，提升了大学文化的高度。可以说，教授思想与人格的高度，就代表了一所大学文化的高度。

不难发现，所谓大学文化，其基本的落脚点就是青年学生的优良学风，也就是莘莘学子对知识与真理的孜孜以求；其根本依据就是堪称优秀的大学教授，他们以纯粹学问之研究引领青年学生，春风化雨，作育英才。或如竺可桢校长所言：“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笃行的学者。”竺可桢校长可谓深谙大学之道。大学文化，中心在教授，重在教授研究学问、教育后进，落脚点在学生的优良学风，终在养成学生博学笃行的人格。大学文化建设就是切实地凸显教授在大学中的重要性，通过他们精于学问、教育后进，以发育优良的学风，培育青年学生博学笃行，成人成才。这可谓大学文化建设的中心与灵魂所在。

1931年，苏步青从日本学成回国，到了浙江大学。给他的聘书上言明月俸大洋300元，但学校经费无着，名为副教授，苏步青连续4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有人告诉邵斐子校长，苏步青面临很多困难，准备重归日本。“半夜里，邵校长敲开我的门，核实听来的消息，当我无可奈何告知确有如此想法时，邵校长脱口而出：‘不能回去，你是我们的宝贝……’听到‘宝贝’两个字，我全身像有一股暖流在涌动，忙问是真的吗？邵校长肯定而有力地说了：‘真的。’我马上说：‘好啦，那就不走了！’这天夜里，是我从日本回来后第一次这么激动。没几天，邵校长亲自为我弄到1200块大洋，解决了我无米之炊的困难，让我终身难忘。”这里，留住苏步青的，一是邵校长“你是我们的宝贝”这句话，它既让苏步青感到学校对他的重视，更让他体味到一种人情的温暖，可谓感情留人；二是切实解决苏步青的困难，让他得以从日本把夫人和小孩接过来，这是以实际行动留人。从此，苏步青就怀抱着一个信念：“浙大校长把我当宝贝，我绝不能辜负学校对我的期望。”邵校长之后的竺可桢校长一如既往地重视人才。浙江大学之所以在当时达到很高的办学水平，跟几位校长慧眼识才、千方百计凝聚名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什么是大学文化？很简单，就是把杰出的大学教授当宝贝的文化。如何建设大学文化？就是从延聘名师，留住名师开始。直白地说，建设大学文化，就是建设大学之人，中心就是建设大学教授。延聘好的教授，并且充分发挥他们教书育人的职能，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住，这不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全部，但却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灵魂。离开了这一条来谈大学文化建设，只能是伪大学文化。

当然，大学教授的延聘固然重要，相配套的图书仪器设备也不可或缺。“一个大学必有众多超卓的学者，才能感得图书设备的重要，而且会扩充合用的图书；也惟有丰富的图书，方能吸引专家学者，而且助成他们的研究与教导事业。换言之，人才与设备二者之间是必然辅车相依，相得益彰的。”正是以大学教授为中心，辅之以优良的教学研究设备，主要是图书馆和实验室设备，再加上优雅的校园文化，才能构成激励青年学子精神成长的大学文化环境。梅贻琦在1928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在其就职演说中提到，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全在于它有没有好的教授，这就是他后来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的最初表达，我们不妨重新来研读梅贻琦的大学阐释。如果从文化层面来分析，那就是说，大学文化的根本在于有没有大师，以及大师是否真正处于大学的中心，而不是大楼，也就是大学物质条件，尽管物质条件也是十分重要的，但那并不足以构成一所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否则，我们举大国之财力，要建几十所世界一流大学也完全不是难事。国难中的西南联大，条件只能用艰苦来描述，但谁也不能否认，它几乎就代表了20世纪中国大学的最高水平。我们今日大学少的不是大楼，而是大师。大师是需要成长与培育的，如何培育和成就大师，这可谓今日大学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如何培育大师？这需要相应的大学制度支持，唯有让大学凸显以大学问为中心，大师

才有可能生成。大学为何凸显学问中心，而非行政权力中心？是因为大学的根本事务是以大学问为中心，大学教授对大学事务有着最重要的发言权。如何建立以教授为中心的大学管理机制，就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的中心。不管我们采用何种管理模式，充分体现教授在学校重大事务上的参与，可谓现代大学的通则。当年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任内不曾设副校长，校行政机构的主要成员，以及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的院长、各系的系主任、一年级的班主任等，都选派学有专长且行政办事能力强的教授担任。学校行政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校务会议，一切重要事务均经集体讨论。校务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院院长以及教授代表组成，有时也有学生代表参加。这种管理体制，既实行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权力得以制衡，又发挥了各领域学者之长，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大学教授在大学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主人翁精神。浙大之学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内部组织管理体制。对此，竺可桢校长深有体会：“大学宜民主，固甚彰明，惟民主有先后，当自教授始，如此可冀各安其位，爱校胜己，历10载、50载以至一生工作如斯；学生时间较短。故宜采用教授治校。”我们今天同样需要积极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践，以保障创造性的知识生活在大学中的根本地位。

正如竺可桢校长所言：“余以为大学应以教授为重，主张教授治校乃是余12年来之一贯政策。”如果说某一位校长重视教授是一时性的，那么教授治校则是保障教授在大学地位的长期性的制度安排。正因为教授在大学里得到充分的重视，教授的影像才会成为大学里最重要的风景，教授治学为人的佳话也得以成为大学鲜活的文化资源。这或许是民国大学教授佳话迭出的根源。今日大学，为人津津乐道的教授故事越来越稀少，这固然跟今日大学深度体制化有很大关系，更重要的是大学教授越来越多地像大学的雇员，成为完成各种工作量的机器，而不足以孕育、显现足够的人格力量于大学空间。很难想象，一所大学并不重视其中的大学教授，或不能长久地重视大学教授，但建成了各种哪怕是出色的装饰性校园文化符号，难道这算得上是好的大学，或者说好的大学文化？

（四）当前大学文化建设：让大学回归人的大学

索尔仁尼琴于1978年应哈佛大学邀请作毕业典礼演讲，他在开场白中提醒人们，哈佛的校训是“真理”，然而“真理”的追求必须全神贯注，稍有疏忽即易迷失；而且“真理”通常无可避免地会惹人不悦。这提示哈佛校训的精髓：“真理”只有“美丽”是不够的，同时必得是“踏实”的。我们今日的大学文化建设，绝不只是弄一个花哨的口号，拟一句精彩的校训，而是如何将宏大的理念转化为日常的行动，转化为大学师生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认准大学文化的要义所在，抓住关键，一点一滴，切实地行动，长久地坚持，并随时准备迎接某种必要的不悦，甚至阵痛。

2006年国内某著名大学校长提出，作为精英教育的实践形式之一，该校2006级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其中对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的学生还是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高尔夫球。大学开设高尔夫课程未尝不可，但一定要把高尔夫课程与大学的精英理念结合起来就未免肤浅。对卓越人格的追求，这是大学精英教育的要义。大学文化当然要体现必要的精英品格，但这种品格并不是外在的时尚点缀，而是自我人格的内在发展。文化的核心是价值，大学文化的中心就是要彰显大学的价值。大学的核心价值就是培养人，培育年轻一代的健全人格，养成他们服务社会的品格与能力。大学之大，乃是大智、大爱与大德的结合，这才是成熟精英品格之所系。大学文化乃是昭示大人格的文化，不是给青年学生以趋时的技能与媚俗的资本。大学文化就是要彰显大爱、大智和大德，以引领青年学生健全成人，这才是大学文化的灵魂所在。

文化的中心是人，大学文化的中心就是大学之人。大学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中心，基于人，且为了人，而不是以物为中心。这个“人”，就是大学教师和学生。尽管物的建设是必要的，但物的建设乃是为了人的活动的展开，为了提升大学师生的精神生活品质，为

了成就人的卓越。大学文化建设中，人和物质乃是处于不同层级的文化要素，人是根本性的，物总是次一级的。良好的物质条件可以促进人的作用，却无法替代人的作用。换言之，最好的物质条件也不能替代人的匮乏。哈佛大学之为哈佛大学，跟它是否有漂亮的高尔夫球场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跟其大小、分门别类的近百家图书馆有联系，跟世界一流实验室有联系，更重要的是，跟它所拥有的众多世界第一流的学者和教授有联系，或者说，那就是哈佛之为哈佛的根本所在。哈佛人对真理的孜孜以求创生着鲜活的大学文化，其制度设计契合这种活法，成为大学文化价值的保障，同时也成为大学文化价值的有机载体。

这意味着当下大学文化需要切实地回到人，回到大学作育英才、培养人格的使命，以大学师生创造性的知识生活为中心，致力于大爱、大智与大德的追求，引领社会的精神风尚。当下大学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就是大学文化主题的偏离，以可见的物质世界的改善为中心，再冠之以各种时髦的口号。我们今日的大学文化建设，究其实质而言，乃是行政化背景下的手段性文化的建设；是大学中的文化符号的建设，而不是大学文化本身的建设；是“出自”校长及校长所代表的管理体系的文化建设，而不是“出”校长及校长所代表的管理体系的文化建设。换言之，大学校长及其所代表的关系体系本身就应该应该是大学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但在现实中，他们只是大学文化的“给出者”。这样的建设当然可以让大学看起来像大学，但也只能是形似而已。

建设大学文化，需要从大学核心制度着眼，政府与社会给予大学足够的尊重，大学自身需以追求学术、培育人才为中心，切实地维护大学教授在大学事务中的主体地位，从大学校长的遴选到学校重大事务的管理，再到学术事务的治理，都体现大学教授的主体性，由此而真正让大学行政事务充分体现大学师生求知问学的需要，而不是反过来让大学师生服务于行政管理体制，由此而让大学回复到大学问的本质所在，这才是大学文化建设的返本归元。苟如此，今日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容与目标，难道不就是如何让大学回归大学，回归教授与青年学生的大学，回归“大学之人”的大学？

（摘自：《大学文化建设：何种文化 如何建设》高等教育研究 2014 年第 35 卷第 1 期）